

南宋宰相赵鼎奏疏的忧愤之情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南宋宰相赵鼎的奏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自己身处其间的政治遭际和态度,其间不乏激烈情感的外现。绍兴四年八月“御札参知政事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对于这一次任命,赵鼎的奏疏中充满忧愤之情,他从“人言可畏”和当权者的“沮抑”两个方面落笔,议政与陈情自然结合,文中的议论因其真情的注入更具感染力,而情感的表达也因议论的犀利而增强了内力。

关键词:赵鼎 奏疏 忧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6—0015—05

赵鼎是南宋初年功绩卓著的宰相,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恰是南宋朝廷的时局最为艰难的时候。他的一生与朝政密切相关,围绕着朝廷的对金策略及其由此而引发的政治生涯的起落,赵鼎在其奏疏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自己身处其间的政治遭际和态度,其间不乏激烈情感的外现。这些篇章再现了南宋朝廷初期的艰危动荡对朝臣的深刻影响,以及朝廷内部的政争所促发的朝臣的各种情感。本文仅就其与朱胜非的矛盾所涉及到的部分展开论述,以此探究赵鼎的郁愤之情。

绍兴四年八月,赵鼎替代张浚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围绕前任张浚的去职,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对于赵鼎的此次任命,宰相朱胜非的不满也由暗而明,且多方掣肘。这一切使赵鼎深感愤懑,当他把这种情感带到此期所作的奏疏中时,真可谓激情澎湃。

绍兴四年八月“庚辰,御札参知政事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初,张浚既召归,言者数上章,谓若无大帅,必失两蜀。上与朱胜非谋曰:‘西帅难其人。’欲以赵鼎为之,如张浚故事。胜非曰:‘圣谟如此,臣谨奉诏。’自是言者益力。踰月,乃有是命。鼎留身辞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台谏。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专之可也’。”^[1](卷七十九,绍兴四年八月庚辰条)这则记录传达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高宗为避免“若无大帅,必失两蜀”的危局,特命赵鼎西帅,显示出高宗对赵鼎的信赖,所谓“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专之可也”是也;另一方面却是赵鼎本人的“辞以非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赵鼎此时的“辞以非才”并非故作姿态,乃是其真实思想的显露。可以说,在“辞以非才”的背后,高宗与赵鼎都有各自的原因。

就高宗的命帅赵鼎来看,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赵鼎之前,张浚积极筹划对金主动出击之策,“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张浚为解东南之困,欲谋引金兵于西以牵制之:“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

收稿日期:2010—12—30

作者简介:陈忻(1963—),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南宋绍兴和议前的朝臣诗文与政局之关系》(12YJA75100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010YBRW71)

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急调兀术等由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2](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但是,富平之战以宋师败绩而告终,并直接导致了南宋在西南地区极为被动的局面。西南对于南宋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张浚召归之后,“言者数上章,谓若无大帅,必失两蜀”。高宗为保证西南地区的稳固,就需要派遣确可信任的重臣。二是赵鼎自身“节概刚方,器量阔达,临事绝回邪之见,为政多岂弟之称。”^[3](沈与求《赐新知平江府赵鼎辞免不允诏》,《龟谿集》卷四)“以直道正言,历跻宪府;以嘉谋硕画,尝赞筹帷。名声推重于朝廷,风采耸闻于天下。”^[3](蔡崇礼《赐新除参知政事赵鼎辞免恩命乞改除一在外官观差遣不允诏》,《北海集》卷九)就赵鼎已有的政声治绩来看,其治理军民、镇抚一方的能力也是显著的:绍兴二年十月,赵鼎除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时参知政事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太尉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皆驻军府中,军中多招安强寇。鼎为二府,素有刚正之风,庾、世忠皆加礼,两军肃然知惧。民既安堵,商贾通行焉。”^[1](卷六十一,绍兴二年十二月戊戌条)绍兴三年三月,赵鼎移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在其任上,“政治群情,军民各得其所。威闻四境,盗贼不窥其封。惟显绩之既彰,知远猷之可赖。”^[3](蔡崇礼《赐端明殿学士左朝奉大夫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赵鼎赴行在诏》,《北海集》卷八)九月,充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鼎守洪都踰再岁,戢吏爱民,盗贼屏息,一方赖之。”^[1](卷七十二,绍兴四年正月丁丑条)。绍兴四年三月赵鼎除参知政事,荐岳飞“知上流利害”,筹划收复襄阳,“飞出师,竟复襄阳。”^[2](卷三百六十《赵鼎传》)正是基于赵鼎表现出的特别的才干治绩,高宗“乃趣召于帅藩,俾参陪于国论。”^[3](蔡崇礼《赐新除参知政事赵鼎辞免恩命乞改除一在外官观差遣不允诏》,《北海集》卷九)

就赵鼎这方面来看,对于此次“付之以本兵之寄,假之以专阃之权,将备责于施为,固不容于逊避”^[3](赵鼎《谢除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忠正德文集》卷四)的任命,他的接受却是被动的。虽然从其所上奏议《奏乞参酌吕颐浩等申请指挥状》、《条具宣抚处置使司画一利便状》、《乞辟差官属依例带出见任职事状》、《督府申请援乞降诏旨意并录赐张浚诏书缴进》、《乞降指挥樁管粮食状》、《乞降旨意乘载輜重小船并合逐军自行备办状》来看,他实际上已经展开了各项赴任的准备工作,对即将出行的诸多事务皆已详细论及。但应当注意的是,赵鼎此期的奏疏中对于此次任命却是充满了抑郁愤懑之情。详究其间,其悲愤主要是基于朝廷内部的纷争。

一、“人言可畏,将上累于眷私”

对于此次任命,赵鼎首先是力求辞免,其理由便是“曾微尺寸之功,积有邱山之衅”,“人言可畏,将上累于眷私”。^[3](赵鼎《辞免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忠正德文集》卷四)其实早在此次任命前,赵鼎早已卷入了朝廷上层的有关内政外交的争斗之中。他每每在国家艰危之际,上书分析敌我对立之势,并建议国策:建炎四年春正月,“时或传金人在建康筑城为度夏计”,他上《论敌退事宜》;^[1](卷三十一,建炎四年春正月辛未条)建炎四年“三月,车驾在温州。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车驾进发,某力言其未可”,上《论回蹕》。^[3](赵鼎《建炎笔录》,《忠正德文集》卷七)建炎四年夏四月“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赵鼎上《论西幸事宜状》。^[1](卷三十二,建炎四年夏四月甲戌条)建炎四年夏四月“甲申,乃下诏亲征。中丞赵鼎以为平江残破,最酷人心,不乐是行”,^[4](卷八)上《论亲征》。赵鼎上书中所表现出激烈情感与其议政建言都难免与在朝者有齟齬之处。

建炎四年四月,“韩世忠败金人于黄天荡,宰相吕颐浩请上幸浙西,下诏亲征。鼎以为不可轻举。颐浩恶其异己,改鼎翰林学士,鼎不拜。改吏部尚书,又不拜,言:‘陛下有听纳之诚,而宰相陈拒谏之说;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坚卧不出,疏颐浩过失凡千言。上罢颐浩。诏鼎复为中丞……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八月,“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张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阳遂陷”^[2](卷三百六十《赵鼎传》)十月,赵鼎“奏诘刘光世等违命不救楚州之罪。”^[1](卷三十八,建炎四年冬十月戊子条)在这些争斗中,无论是在朝廷的对金策略方面,还是协调武将方面,都可谓阻力重重,赵鼎深切地体会到立身朝廷却难以施展方略的无奈。他曾因无力行使职权而愤懑地陈辞求去:“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将,何以励其余?陛下有唐宪宗任使之明,而臣无杜黄裳协赞之助”。因力求去。”^[4](卷九引《赵鼎事实》)他也曾因为“忤旨”而出朝:“会辛企宗除节度使,鼎言企宗非军功,忤旨,出奉祠。”^[2](卷三百六十《赵鼎传》)这些亲身感受到的朝内朝外各方势力的对立不谐以及相互间的排斥打击带给赵鼎的郁愤之情是明晰深刻的。建炎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甲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鼎罢”^[1](卷三十九,建炎四年十一月甲辰条),在出朝赋闲期间,赵鼎所作的

诗歌已经明白地表达了他对“人言可畏”的真切体会：

功名常若归难必，拙直悬知退有余。避谤杜门宾客绝，病痰妨饮酒杯疏。^[5]（卷一六四四《示陆昭中》）

微词动招谤，烂醉可藏身。^[5]（卷一六四四《次韵富季申寄示》）

诗不名家免招谤，酒虽作病要全身。^[5]（卷一六四四《六月十三日书呈元长》）

更将满耳是非语，换作松风溪水声。^[5]（卷一六四五《山中书事》）

随分谋生何厌拙，莫因饮啄傍人飞。^[5]（卷一六四五《有送生鹄者放之使去》）

诗歌中的“招谤”、“避谤”、“是非语”所昭示的居官朝廷的愤懑难安，以及“拙直悬知退有余”、“随分谋生何厌拙”的自我表白，都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抑郁不平之气。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朝廷的任命，赵鼎屡屡请辞。现存沈与求《龟谿集》中的《赐新知平江府赵鼎辞免不允诏》、綦崇礼《北海集》中的《赐端明殿学士左朝奉大夫江南西路安抚大使兼知洪州赵鼎乞除一宫观差遣不允诏》、《赐新除签书枢密院事赵鼎辞免不允诏》、《赐新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上表辞免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赐新除参知政事赵鼎辞免恩命乞改除一在外宫观差遣不允诏》、《赐新除参知政事赵鼎上表辞免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即可为证。但是赵鼎的辞免并不能消除他所受到的朝廷中人的忌恨。绍兴四年八月这次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的任命亦复如此。据《中兴小纪》卷十六引《赵鼎事实》曰：

是时当国者不可否事，事多不决，吏缘为奸。每鼎受状之日，人皆骈集，由是见忌。初，上即位，以御营使专总军政，其后并归枢密院，宰相得兼领。至是言者论其失，乞令参知政事通知其事，上以为然。言者又谓当国者不知兵，意专以属鼎也。于是忌者益切，至除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使，皆忌者之说也。

这样看来，赵鼎此次的“留身辞以非才”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赵鼎“受状之日，人皆骈集”，是因为其做事风格与“当国者不可否事，事多不决”相对，这又使得他的“见忌”成为必然。加之“言者又谓当国者不知兵，意专以属鼎也”，则“忌者益切”本在意料之中。当此“万目睽睽，指为迂阔”^[3]（赵鼎《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忠正德文集》卷七）之际，赵鼎对“任专则媚嫉必生，权重则嫌谤立至”的现状极为愤恨，在其《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中，他借张浚经营川陕的前后遭遇愤怒地指斥了以无为有、不安于分义的小人，文中的情感十分激烈：

向者陛下当建炎图治之初，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事力百倍于今。浚于陛下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砺山带河之固。君臣相信，内外相资，委任之笃，今古无有。而终致物议，以就窜逐……今考究其用心，推寻其情实，丧师失地，错缪之迹则有之，未必尽如言者之甚也。大率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则小人不安于分义，谓名器可以虚授，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川蜀之士至于醵金募士，诣阙陈论，展转相传，以无为有，一经指摘，何以自明？

赵鼎对“小人不安于分义”，“以无为有”的行径深恶痛绝。据《宋史·张浚传》记载，建炎年间张浚经营川陕，“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川”。“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开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但是，一经富平之败，张浚便备受小人指责。“川蜀之士至于醵金募士，诣阙陈论，展转相传，以无为有，一经指摘，何以自明？”赵鼎对此“人人诟骂，肆言丑诋”，“极人间之大恶，皆归之于浚”的行为充满愤慨之情：

浚固有罪矣，台臣抨弹之可也，谏官论列之可也，人君赫斯震怒，虽诛殛之，浚亦无憾。今乃下至草泽布衣之士、行伍冗贱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书投牒，人人诟骂，肆言丑诋，及其母妻，甚者指为不臣跋扈，极人间之大恶，皆归之于浚。呜呼！一何甚哉！^[3]（《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忠正德文集》卷七）

张浚最终在小人的奔走诟骂与朝中要员的排斥下去职。据《宋史·张浚传》记载：富平之败后，“会有言浚杀赵哲、曲端无辜，而任子羽、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闻王似来，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吕颐浩不悦，而朱胜非以宿憾日毁短浚，诏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陕，以檄发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举洞霄宫，居福州。”朝廷疑之、宰相不悦、同僚以宿憾毁短弹劾之，终将张浚经略关陕之功全然勾销。当赵鼎审视这一切时，他在《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中悲愤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有志之士虽欲冒犯死亡，为国立事，而每以浚为鉴戒也”。在此文中，他也明确地表露出对此次任命充满疑虑担忧的原因：“夫以浚之功，与陛下之信也，

而谤者至此,则明君不能自信矣。今臣无浚之功,陛下之信臣无如浚。以有功而见知也,乃当此重责,远去朝廷。臣恐好恶是非,行且纷纷于聪明之下。”

二、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辩

对于朱胜非的政事,《宋史》卷三百七十六《魏叟传》有这样的记载:“时朱胜非独相,(魏)叟论胜非无所建明,惟知今日进呈一二细故,明日启拟一二故人,而机务不决,军政不修,除授挟私,贤士解体。”上文提到,赵鼎的从政风格与之不同,故当“受状之日,人皆骈集,由是见忌”,这也是朱胜非沮抑掣肘的重要原因。所以,“人言可畏”固然是赵鼎辞免的原因,而朱胜非的“沮抑”更与赵鼎的忧愤直接相关。

《宋史》卷三百六十《赵鼎传》载云:“朱胜非兼知枢密院,言者谓当国者不知兵,乞令参政通知。由是为胜非所忌。除鼎知枢密院、川陕宣抚使。鼎辞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黜陟专之可也。’时吴玠为宣抚副使,鼎奏言:‘臣与玠同事,或节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陕诸军事。鼎所条奏,胜非多沮抑之。”有关朱胜非与赵鼎的矛盾在《宋史·朱胜非传》中亦有反映。该传明确地指朱胜非“再相,忌赵鼎。鼎宣抚川陕,欲重使名,以制吴玠。胜非曰:‘元枢出使,岂论此耶?’盖因事出鼎,而轻其权。人以此少之。”朱赵的之间的不谐,也是赵鼎愤激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绍兴四年九月壬子条记载:“赵鼎之出使也,乞度牒等如张浚例,朱胜非难之。鼎请不已,然后许焉。”“鼎又言:‘臣随行兵,除王进外,取于密院及诸处才二千人,而强壮者曾无数百。又钱帛合依张浚例,初乞钱百万,止得五十万。度牒二万,止得三千,再乞,得万八千,又乞,始足元数。臣日侍宸扆,所陈已艰难如此,况在万里之外?惟望睿断不为群议所移,臣实万幸。”从这里的记载来看,赵鼎的出使确可谓艰难,而其愤懑也不可能不因此而兴发。

面对朱胜非的“沮抑”,赵鼎上《论防边第一疏》,他以秦之王翦、汉之陈平、唐之郭子仪的成功为例,认为欲取得“将帅所以竭忠而士卒所以用命”的效果,必须有“所请必听,所欲必得,纤悉曲折无不周致,信任既笃,乃始责以成功”作为前提。但是,当他被委以都督川陕诸军事的重任时,却是方方面面遭受掣肘:

今臣备员督府,近在阙庭,施置之间,已多齟齬。请兵于诸军,非为臣之使令也,将以备出战入守也;请给于公帑,非为臣无资财也,将以劝功赏士也;辟士于幕府,非为臣私亲旧也,将以得人为用也。然所谓兵者不满数千,半皆老弱,不胜甲冑,疲瘵跛倚,可笑可怜;所齎金帛,至为微少,犹控颜沥恳,几同乞丐;荐举士人,皆惮远适,面得睿旨,令除京局以重观望,荐章甫上,弹奏已行。使臣意气忧沮,举措畏忌,退视宾僚,有腼面目。士大夫间或笑其单弱,或忧其无成,皆谓事大体轻,有名无实。

在此文中,赵鼎既愤懑于“顾臣一身,亦何足道?顾国事安危,不知安在”;又为自己孤踪远去,委屈难辨而悲恨:“孤踪远去,君门万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辩?”他对自己的这次出任所能达到的效果充满疑惑:“若但为侥幸之图,姑行尝试之说,一切苟且,恬不介意,号曰出师,其实何补?”“茫然遐徼之外,欲自诉于陛下则不可,欲尽载之纸笔则不能,怅焉自失,莫之为计”,其中所流露出的悲怨怅恨之情十分浓郁。

赵鼎此期的奏疏,因其政治上的力争而见其风骨,又因其情感上的忧愤而生动饱满。一般说来,赵鼎总是在其奏疏中倾注了强烈的情感,使议政与陈情自然结合,文中的议论因其真情的注入更具感染力,而情感的表达也因议论的犀利而增强了内力,二者相互促进,使这类文章的可读性大大增强。

参 考 文 献

- [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 宋史[M].中华书局,1985.
- [3] 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4] 中兴小纪[M]. 四库全书本.
[5]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The Prime Minister Zhao D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is Worried and Indignant of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Chen Xi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47 , China)

Abstract: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by Zhao Di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ruly record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his political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 at that time. Hi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as full of his worried and indignant this time. Talking about politics and presenting feelings was combined naturally, on one hand, the remark was more appealing because of his true feeling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pression of feelings was more reinforced because of the sharp remark.

Keywords: Zhao Ding; memorial to the throne; worried and indignant